

预算约束的软化

——根据企业数据进行的分析

(匈) J·科尔内 A·马蒂茨著

邱树芳 刘吉瑞译

本文首先讨论了企业“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的概念。然后叙述了本文作者和几个合作者一起进行的、旨在处理1975年到1980年间，匈牙利国有企业财务数据的统计检验。检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软预算约束的理论假设与经验进行对比。

1、中央对国有企业收入再分配的范围很大，结果实际盈利率偏离了“原始盈利率”(本文假定盈利率“剔除”了对企业有直接影响的最后阶段的收入再分配因素，也就是按没有补贴和税收时的盈利率计算)。2、工业中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远大于农业中的这种作用。3、亏损企业也获得利润留成。利润留成和原始的以及实际的盈利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单调增加的相关关系。4、收入再分配拉平了企业间的利润和盈利率。5、企业的生存几乎是有保证的。一个企业的停业清算或合并，既不取决于上年的原始盈利率，也不取决于上年的实际盈利率。作者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即使在1980年也看不到这种约束“硬化”的迹象。

本文的作者之一，亚诺什·科尔内在他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声称：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本文根据匈牙利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试图检验软性预算约束这一假设的有效性。

软预算约束的含义

我们先简要概括一下硬预算约束和软预算约束的含义。借此机会我们也想澄清一下对这一概念的某些误解。

企业出卖产品获得销售收入。如果企业必须最终从销售收入中补偿其各种支出，那么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性的。企业发生亏损并用尽了全部库存现金弥补亏损，它迟早会倒闭。企业投资完全取决于它过去活动的盈利和它对未来获得利润的预期。为此，企业不仅从财务上和道义上对利润感兴趣，而且利润对它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它生死存亡的问题。企业能否生存取决于利润，即使企业能够生存，它是否能发展也取决于利润。

假若税则和纳税不受企业与上级之间讨价还价的左右，硬预算约束与企业向国家纳税并

不矛盾。

进而言之，硬预算约束与企业从银行、从别的企业，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追加投资资金也不矛盾。不言而喻，贷款与销售收入一起记入财务平衡表的收入一方，而债务和利息的偿还、生产和管理费用等一起记入支出一方。但是，归根结底企业不可能依靠贷款渡日。如果企业的债务比它的销售收入增长更快，如果频频出现支付困难，甚至愈益严重，那么企业的信贷声誉将受到损害。当企业不能履行其债务偿还和利息支付的日常义务，或者失去偿还能力、债权人不准备继续容忍下去时，企业的财务失败便会临头。企业的硬预算约束、严格的信贷制度、倒闭的风险、持久亏损企业的恐惧感等都是相互紧密依存的现象和条件。

有四种不同的过程可能造成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四个过程中的每一过程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四个过程同时并存。

1、企业收到国家为弥补企业的亏损或成本的提高而给予的补贴。这种补贴可以是偶然一次性的，也可以是定期的；可以附加在企业的某种产品上，也可以作为对企业（或一组企业）全部活动的补贴。

2、企业获得免税优惠以弥补因成本提高造成的亏损。也许从企业建立之初就“诉诸实行”，也可能只是在债务不能按期支付时才获准免税。

3、信贷制度是“软性的”。这并不表现在利率上，而是表现在实际存在（并不是宣布）的为获得贷款而竞争的规则上。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实际按照什么原则选择贷款对象？许诺给予哪些企业优惠和最有利的贷款条件？或者哪些企业遇到困难需要银行的帮助？信贷制度软硬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银行坚持要求遵从多少信贷条件？是否迁就哪些不能履行它们的债务和利息支付责任的企业？

4、国家行政机构规定某些价格或者确定提高价格的上限。如果不是企业必须根据外部给定的价格调整其成本，而是通过其他迂回的方法，国家物价机构根据现行的成本调整价格，那么国家定价就有一种“软化”作用。由此看来，是公开地进行这种调整还是以隐蔽的价格上涨的形式进行这种调整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的症结在于由于获得国家物价当局的批准，企业把它的亏损和提高了的成本转嫁到买者身上去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每一企业预算约束的“软或者硬”不能孤立地通过考察这个企业暂时的财务状况来描述。根本不应这样提出问题：企业“A”1978年的预算约束是软的，企业“B”1980年的预算约束是硬的。预算约束的“软或者硬”是一定行为方式的比喻的说法。这种行为不是单独地根据某个企业自己当前的经历独立发展的，而是形成并植根于长期丰富的生活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关于获得利润或造成亏损的结果的预期——一种对必须承担的亏损风险和利润好处的主观估价。企业越是把它的生存与发展寄托于这种预期（寄托于市场上的好运气），预算约束就越硬。相反，企业越是视利润和亏损对它的生存和发展无足轻重，预算约束就变得越软，因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给它多少或从它这里拿走多少。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知道，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帮助“弱者”摆脱困境，而且也在于国家“拿走”“强者”的显著利润，国家可以使有利可图的企业不再有利，或者使这些企业成为赢利较少的企业。亏损不是灾难，盈利也带不来好运气！

简短的描述分析

本文是根据一个相当长的系列研究的第一部分成果写成的。①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全部国有企业财务平衡表上的大量数据资料输入计算机。根据这些基本数据我们建立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同质可比的指标体系。为满足经济分析的要求，指标体系中有49个特殊的总量指标，这些指标被称为绝对指标。从一些绝对数据我们又得出28个比率指标，我们称为相对指标。这样我们所设计的每个企业每年的指标体系就由77个指标所构成。截止研究工作完成，我们共收集了1975年到1980年六年的资料。

我们把用经验检验经济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希望在处理几百万个数据的同时得出一些确定事物性质的基本结论。虽然我们并不忽视其他研究工作者提出的经济计量预测模型，但是我们想清楚地表明我们在目前的研究框架中不想采用这些模型。

我们借助数据归纳出一些定性结论的目的，在于提出各种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在世界各国理论文献中并非鲜为人知，如果不是局限于经济理论的范围之中，运用其他学科已成就的一些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结论的话尤其是这样。在匈牙利人们对这些问题也不陌生。但这方面研究依然是凤毛麟角，这也是无需怀疑的。因此，我们也把用数理统计方法检验定性的经济理论假设这种方法向前推进一步看作一项重要的任务。

我们不打算在本文中详细论述这项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同前面所说到的，我们这里只是涉及运用匈牙利的经验对企业预算约束的一些假设进行检验。

指标说明

我们不想陷入对整个指标体系的详细论述之中。然而似乎有必要概括和说明那些与本文有关的最重要的指标。这些指标是：②

1. 原始利润
1. 原始盈利率
2. 一般税收和补贴后的利润
2. 一般税收和补贴后的盈利率
3. 财务平衡表上的利润
3. 财务平衡表上的盈利率
4. 再分配后利润
4. 再分配后盈利率
32. 资源收益率

①这项研究是工业部委托进行的。研究的准备工作在匈牙利国家发展银行的领导下完成。研究工作由科尔内负责。

②这些指标的序号都是研究报告中的序号。其中加着重号的数字在原文中是黑体字。—译者注。

11. 再分配比率

8. 投资活动

我们在分析中把各种利润指标放在核心的地位，同样也把来源于利润的盈利率指标置于核心地位。现在我们来依次考察指标 1—4 和 1—4 的含意。

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假定，在给定年份国家决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收入再分配。也就是说，在给定年份里企业所有的销售收入和支出全部按现行价格入帐，不必动用收入去缴纳税款，企业该年度的所有支出都得到补偿。与此相对应，国家也不以任何名义给企业任何资金，并要求企业支付该年给予它的补贴以及相应的免税金额。这个假设合称为原始利润(指标 1)。

事实上指标 1 并未消除再分配的影响。在我们目前所考察的阶段，还没有对包含在产品成本和销售收入中的“完全的”和“累积的”税收及补贴进行估算。(这里的“完全的”、“或累积的”含义与我们讲到编制在列昂惕夫投入产出表中的完全的、间接的劳动消耗或者完全的外汇等含义是相同的。)不可能假设不受国家再分配影响的价格体系并用它来计算生产成本。就指标 1 来说，只是在最后阶段、在生产企业“没有经过”再分配。

值得强调指出，我们对于原始利润不含有任何积极的价值判断。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真正反映经济效益的“真实”指标。只要现行的价格体系依然带有其众所周知的缺陷，甚至不应当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没有把以货币计算的利润、盈利率与生产的经济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我们考察的对象。本文的结尾将会再度谈到这个问题。

指标 2 与指标 1 的差别是在指标 1 中加上了一般的税收和补贴。指标 3 进一步体现了对企业的“指定的”征税和补贴。这种“官方法定的干预”结果在财务平衡表的利润上反映了出来。但是再分配并未止步，由此便有指标 4。

显然上面的描述并不反映实际的时间顺序。我们也不认为实际生活中是首先形成第一个指标，然后跟着是第二个指标，如此下去。这是“逻辑推理的结果”。指标 1 是还没有受再分配影响的“处女”利润，它只是在抽象的层次上通过一系列步骤分离开来，形成了利润 3 和利润 4。①因为后者出现在通常的财务帐目上，因而称其为“实际”利润。

这样我们便区分了再分配过程的三个阶段($1 \rightarrow 2$ ， $2 \rightarrow 3$ ， $3 \rightarrow 4$)。财政部198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列举了 228 个影响利润形成、分配和使用的因素。这对于深入细致地研究再分配问题富有启发意义。但为了获得综合性的结论，我们采取了更具有总量特征的方法。我们限制自己不去逐一分析这个题目以及各种再分配措施的“出发点”，因为我们要寻求的是这些措施对企业整体的共同作用而不是考察具体实行哪一种措施。

相对指标 1，2，3 和 4 是相应的绝对指标与资产总值(指标 48)之比。这些指标可以看作是与“利润率”相似的范畴。

第五个盈利率指标是“资源”收益率指标。这个指标是一个分数，其分子代表财务平衡

①就获得的资料而言，我们还不能从指标 1 开始。我们处理量据资料的始点是通常的利润范畴，即我们指标体系中的指标 3。从这里开始进行了逻辑意义上的“还原”工作：我们把各种税收“还给”企业，又从企业拿去各种补贴，最后我们得到了原始利润。

表上的利润，分母是全部资产价值与年度工资总额之和。（匈牙利会计行话把这个总量指标称为“资源”价值。）这个指标的经济含义与匈牙利商业核算中通常使用的“盈利率”概念相近。

指标11是用来描述再分配范围的再分配比例指标，其内容是用总资源价值去除再分配后利润与原始利润之差所得之商。如果没有再分配，指标11的数值为零。如果向企业征收的税款超过了规定的标准，指标11的数值为负；反过来，其数值为正。这个指标的绝对值越大，原有利润和实际利润之差就越大，再分配作用就越大。

一定年份投资支出总额与资产额之比称为投资活动。在我们的指标体系中它的排列号为8。这个比率近似地反映了一定年度“资本增长”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指标体系在各方面完美无缺。我们也确实考虑建立一些更好的指标以便进一步探讨。

下面我们提出六个我们认为是所研究题目的基本假设，同时叙述检验假设的一些计算。

大规模的再分配使原始利润和实际利润相互脱离

假设1. 中央对国有企业收入再分配的比例很高。由于这种影响，实际盈利率不可避免地与原始盈利率相互脱离。

我们的指标体系允许对这个假设进行多方面的经验检验。可以说我们的计算结果清楚地证实了这一假设。为明白起见，我们想对几个结果作一评价。

表1表示了所考察时期最初和最后两年几个经济部门再分配比例的情况。在几个大的经济部门中只有对农业部门的再分配比例较低，接近于零，而其他部门则较高。如果再分配比率的绝对值大于盈利率指标的平均数值，那么这个比率可以看作是高的。这就意味着反映再分配作用的盈利率超过了100%。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在表1中给出了有关年份原始利润率指标1的平均值。

表1 再分配比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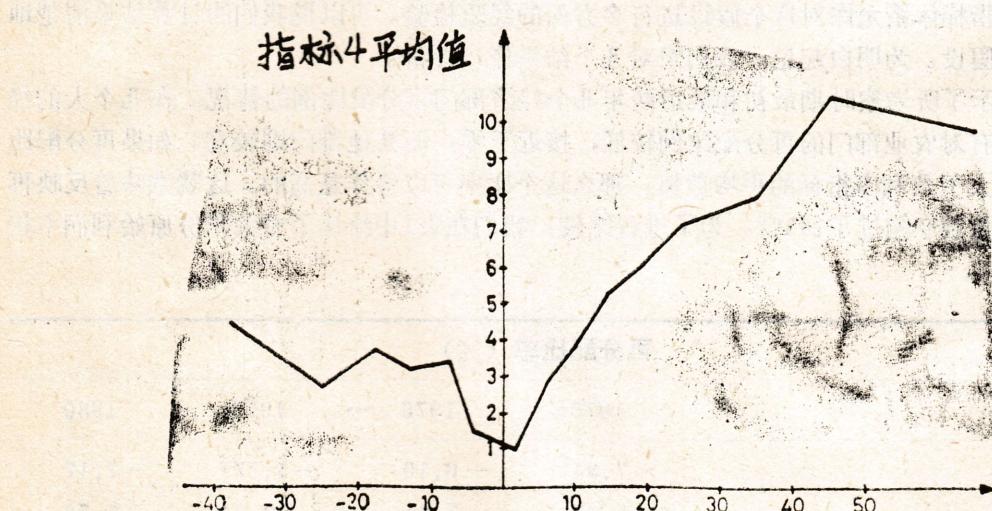
部门	1975	1976	...	1979	1980
工业	-7.34	-6.10		-5.77	-7.17
建筑业	-8.95	-7.61		-13.41	-5.72
农林	0.01	-0.41		-0.62	-0.25
交通和通信	-0.45	0.76		0.61	4.06
商业	-17.06	-8.30		-12.29	-12.02
文教卫生	7.74	0.51		5.73	8.50
整个国民经济	-5.36	-3.76		-3.58	-3.39
整个国民经济的原始盈利率指标	7.64	6.34		5.68	5.15

计算也得出了企业获得的全部补贴与企业原始利润的比率。1980年比值为1.09。数字表明，如果企业收到补贴而不被征税，那么企业的利润就会翻一番。相反，全部税收和原始利润之比是1.28。数字也表明了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大规模的收入“转移”——被分配的收入加上被征税拿走的——总数达到原始利润的两倍。

最后，计算了指标1和指标4，即原始盈利率和再分配后盈利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就国民经济中所有的国有企业来说，系数很小：1978年为0.23，1979年为0.22，1980年为0.22。在工业中，相关程度甚至更小，1978年为0.12，1979年为0.07，1980年只有0.01。这也反映了再分配后盈利率与原始分配相脱离。

当然，在较小的相关系数背后，我们所考察的各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许多种实际上的相互关系。不过我们这里只是寻找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存在一个企业的原始盈利率高于另一个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实际盈利率也按比例高于另外这个企业这样一种趋势呢？如果存在这种趋势，它将会在较高的相关系数上表现出来，这对我们的假设也是一种反驳。从我们的计算结果来看，可以说在全部企业中不存在这种趋势，在原始盈利率和实际盈利率之间不存在平行的运动。

揭示两种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借助于经验回归方法。我们根据匈牙利整个国民经济中所有国有企业的计算结果作出图1，表示了与原始盈利率1相对应的实际平均盈利率4。从图形可以看出，通过对按原始盈利率计算的亏损企业或者盈利极高的企业施加影响，再分配起到了松弛指标1和指标4之间关系的作用。



注释：指标1：原始盈利率

指标4：实际盈利率

图1 1980年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原始盈利率与实际盈利率之间的经验回归函数

显然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两个变量间不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图1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暗含了下面的题目，拉平化问题。

假设2·再分配的作用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更强。

这里我们要叙述的只是许多检验中的两个。一个是表 2，说明在工业中原始盈利率和实际盈利率之间的线性关系非常松弛，而在农业中这种关系相当密切。

表 2 盈利率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工 业		农 业	
	1979	1980	1979	1980
原始盈利率和财务平衡表上的盈利率即指标 1 和指标 3 之间的相关系数	0.29	0.28	0.88	0.76
原始盈利率和再分配后的盈利率即指标 1 和指标 4 之间的相关系数	0.07	-0.01	0.86	0.73

与假设 1 有关的表 1 也表明，工业中再分配的规模远大于农业中的这种规模。

我们这里要提醒一下读者注意，当我们讨论农业时，指的总是国有部门的农业。如同我们已看到的，在农业部门即使是在国有的部分，利润动机也是一直起作用的，企业间的再分配对盈利率的影响要比工业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为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部门是由国有企业组成的，而在农业中情况有所不同。在农业中，甚至国有企业的行为以及与国有企业相联系的中央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服从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分：合作社、居民自留地以及辅助性的私人农业的情况。因为在非国有的经济中利润导向行为占着统治地位。

拉 平 化 过 程

再分配借以进行的标准是什么？在企业之间的再分配中是否存在长期起作用的偏向因素？对于这些问题，匈牙利经济学文献中已提出过几种假设。多数假设认为，如果企业属于以下这几种情况的话，这个企业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优待：a) “优先发展的部门”；b) 大企业；c) 特别是属于 70 年代初上级经过挑选并给予额外注意的 45 个或 50 个大企业之一；d) 由于个人关系而与上级保持良好联系的企业。从 a) 到 b) 这些优待标准有时是交叉重合的。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拥有按照上面列举的二个、三个甚至全部四个标准获得优待的机会。

虽然我们已开始根据我们自己获得的资料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结果暂时还很难得出。因为我们还既不能充分证明也不能驳倒 a) — d) 这些发挥作用的假设。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只有当再分配的尺度找到之后，我们的计算才能充分证明，究竟是哪个标准实际上发挥作用。

假设 3 · 企业间的利润和盈利率被再分配所拉平。

计算结果表明，不论再分配的利弊如何，其范围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盈利率的大小

决定的。图 2 的描述很有启发性。如果一个企业的原始盈利率为负，再分配对这个企业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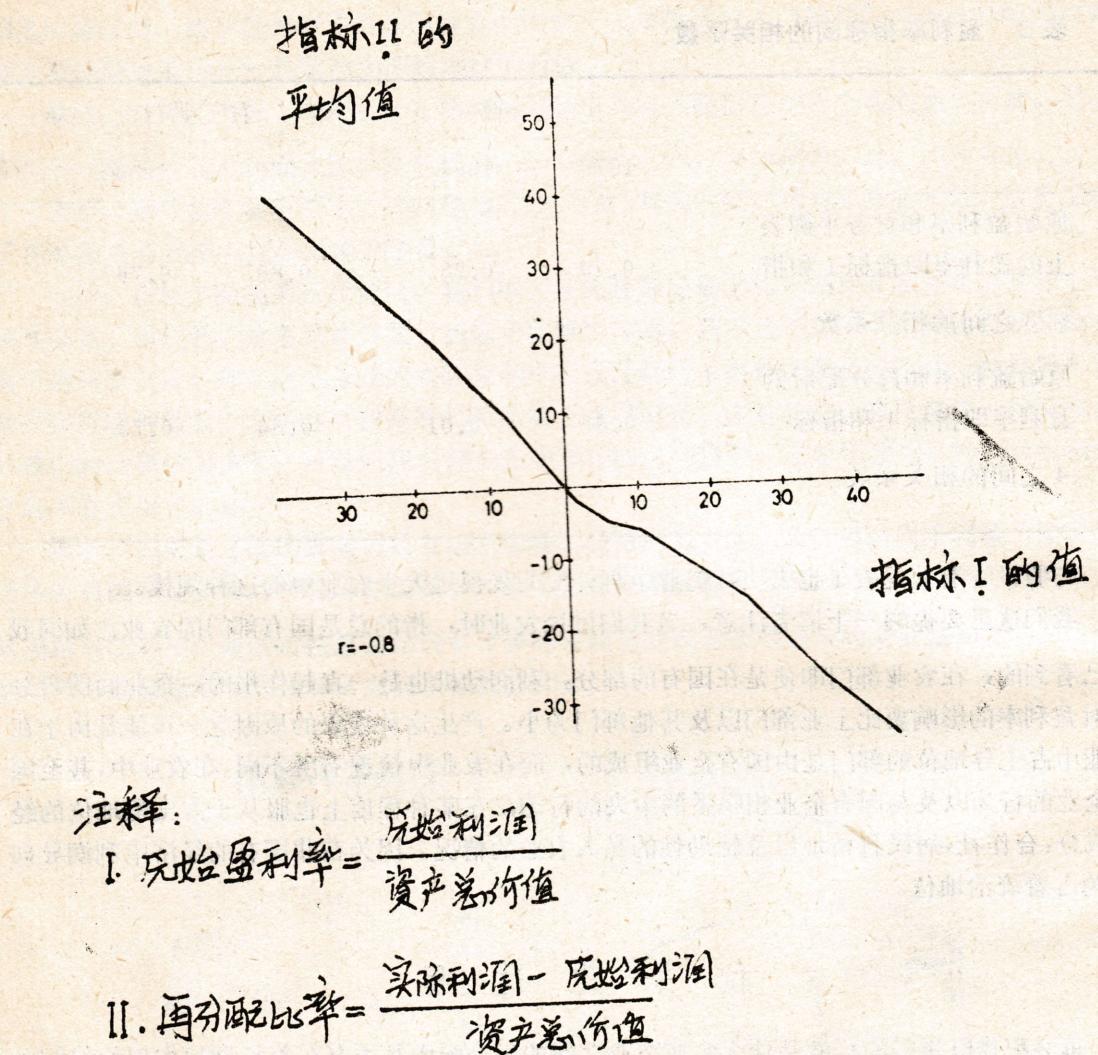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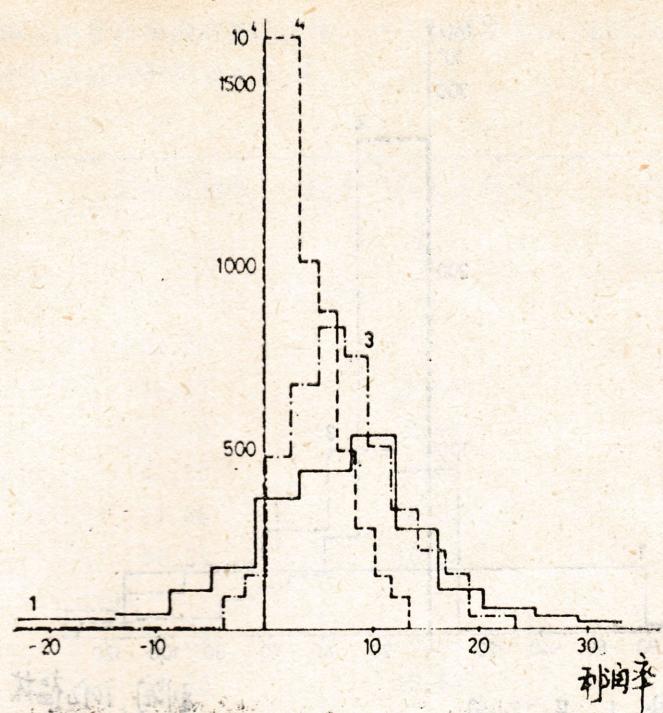


图 2 1980年整个国民经济中作为原始盈利率函数的再分配比率

有利的，亏损越大，获得的优惠也就越多，再分配比率是一个较大的正数。优惠的程度随原始盈利率的提高而下降。如果没有亏损，再分配比率变为负数，它随原始盈利率的增加而降低。这种可观察到的趋势显然由于收入拉平化所致。

在比较各种利润和盈利率的分布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拉平化。

要是没有再分配的话，每个绝对指标 1、2、3、4 和相对指标 1、2、3、4 的分布应是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图 3 和图 4。这两个图形生动地描绘了1980年工业企业的利润指标和盈利率指标的经验分布函数 ($f_n(x)$)。两个图形醒目地说明各种分布的差别很大。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假设 1，即再分配具有很大的规模。再分配使实际利润和实际盈利率的分布大大地偏离了原始利润和原始盈利率的分布。我们可看到，指标 1—4（另一个图形上的指标 1—4）的分布逐渐缩小为“峰状”。



注释：1. 原始盈利率
 3. 财务平衡表上的盈利率
 4. 再分配后的盈利率

图4 1980年工业中盈利率指标的分布

两个图形清楚地表示了拉平两边的情形：赢利企业的利润被拿走，亏损企业则得到补偿。表3和表4说明了同样的现象。通过各个再分配环节，盈利率显著高的企业数目逐渐减少。相反，亏损逐渐“消失”。表4的最后一行数字是令人惊奇的，根据指标4来衡量，几乎根本不存在亏损企业了！再分配使人产生了几乎每个企业都“没有亏损”地经营的幻觉。

下面要叙述的是对盈利率方差的检验。（见表5）。除建筑业外，其他部门每年财务平衡表上盈利率3的方差比原始盈利率1的方差要小得多。除了某些例外，大多数部门大多数年份再分配后盈利率4的方差进一步降低。

表3 1980年整个国民经济中盈利率很高的企业数

盈利率指标	盈利率水平百分数 (%)			
	30以上总数	30—50	50—70	70以上
1 原始盈利率	168	70	54	44
3 财务平衡表上的盈利率	68	62	6	0
4 再分配后的盈利率	8	7	1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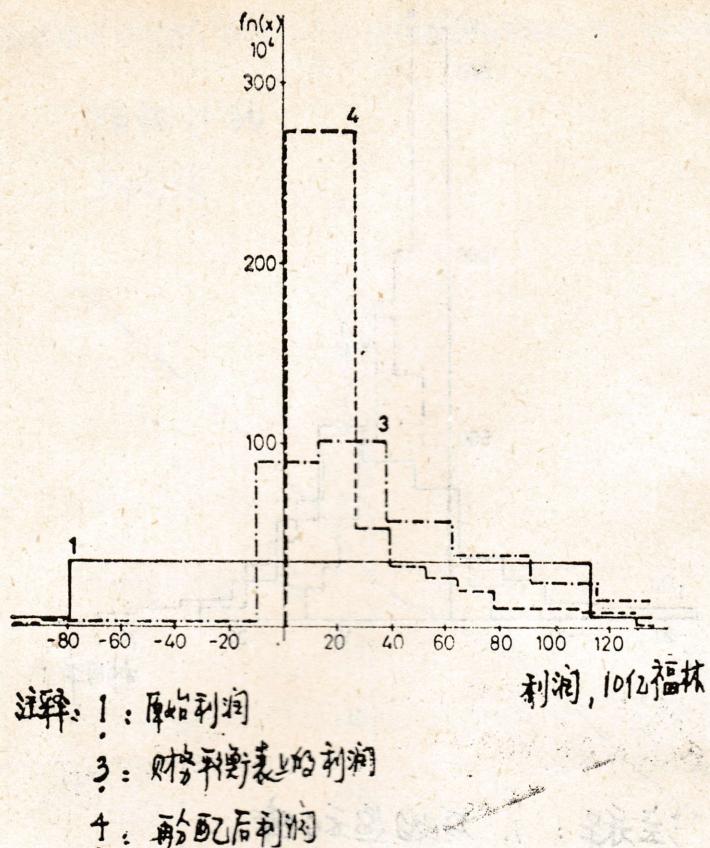


图3 1980年工业企业利润指标数值的分布

表4 1980年亏损企业占整个国民经济中企业总数的比重

利润指标	亏损企业所占的百分比 (%)
1 原始利润	24.02
2 财务平衡表上的利润	2.32
3 再分配后的利润	0.18

利润分成与利润相脱离

...所有的参加者都在跑道上前前后后地排开。没有人发令：“一、二、三，跑！”想跑的开始跑，不想跑的就停下来。谁都不知道比赛什么时候结束...渡渡鸟忽然喊道：“比赛到此结束！”大伙围着它，气喘嘘嘘地问：“谁赢了？”

这个问题颇费思索，渡渡鸟一下不能回答。它手指按着额头站了一会儿，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最后渡渡鸟宣布：“大家都是胜利者，人人得奖。”

列文斯·卡罗：《阿丽斯世界奇遇记》

“利润分成”成为国有企业工人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机制改革时原想通过这部分收入使整个企业集体产生增加利润的兴趣。如果（1）亏损企业不分享利润；（2）赢利企

业留成利润与盈利率之间存在单调增加的关系；（3）这种关系在国民经济的不同部门都是统一的，那么显然利润分成的原则会起作用。

表 5

国民经济部门	原始盈利率	财务平衡表盈利率	再分配后盈利率
	1	3	4
1978			
加工业	32.85	7.81	8.68
建筑业	15.15	16.00	7.58
农林业	6.18	3.95	2.39
交通和通讯部门	12.22	6.49	7.90
商业	41.86	8.22	6.08
整个国民经济	30.30	10.59	7.45
1979			
加工业	33.56	8.04	7.25
建筑业	14.75	15.63	7.33
农林业	6.14	3.93	2.14
交通和通讯部门	11.91	6.19	6.52
商业	45.23	8.19	5.41
整个国民经济	31.31	10.39	6.48
1980			
加工业	32.30	7.51	4.77
建筑业	24.81	14.46	6.22
农林业	7.45	3.91	2.11
交通和通讯部门	15.09	7.03	6.46
商业	37.49	9.46	4.89
整个国民经济	29.35	9.59	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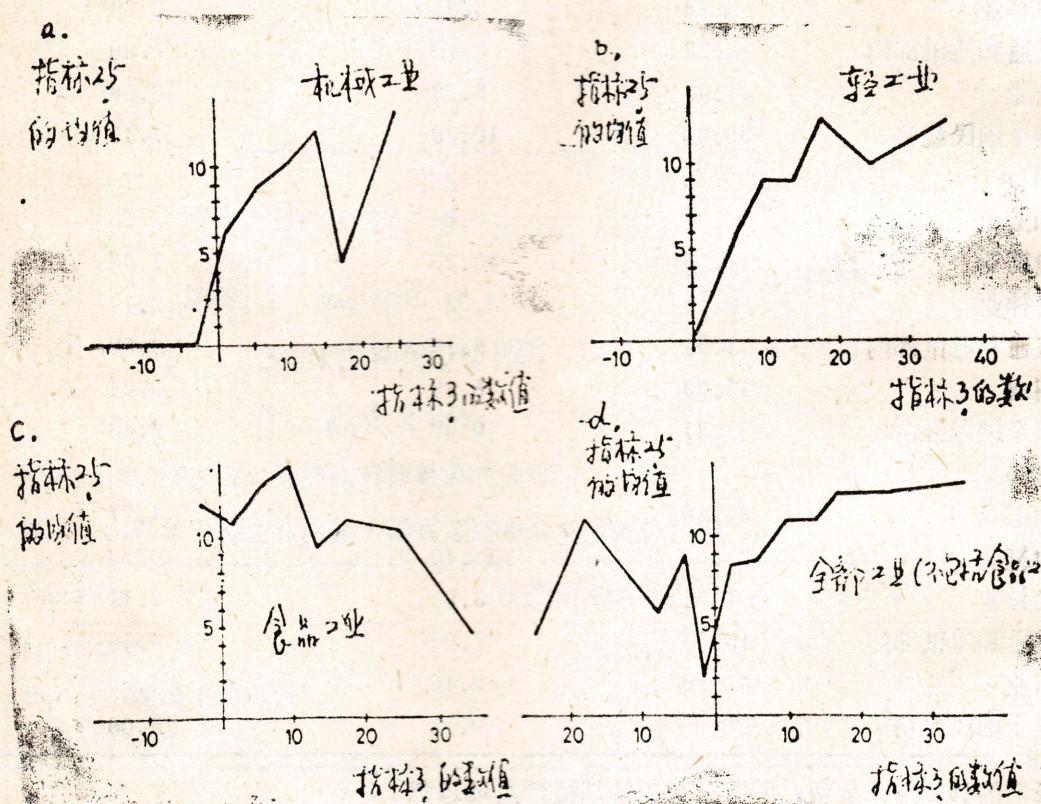
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所有三个条件都被严重地违背了。

假设 4. 亏损企业也分享利润。利润分成和原始利润以及实际盈利率之间不存在统一的、单调增加的关系。

如果在利润分成（或者用通常的说法：“利润分成相当于多少天工资”）和不同的利润和盈利率之间存在不为零的相关关系的话，这一假设就不能成立。但是不支持这种假设的这种相关关系只存在于为数甚少的企业，存在于经济的低级层次，在大多数场合和大多数年份，我们根本找不到利润分成和利润或盈利率之间存在不为零的相关关系。但是利润分成和工资之间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相关关系。利润分成基本上是随相对工资进行调整。事实上所能做的也不过是简单地按比例补充工资。

对这一假设的检验来说，单单考察线性相关是不够的。因为前面所说的三个条件长期起

作用与伴随低度线性相关的非线性相关的存在是一致的。为了进一步检验，我们将对利润分成和财务平衡表盈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经验回归分析（见图 5 和图 6）。这些分析清楚地表明，在一些部门（尽管不是所有的部门）亏损企业的工人也获得利润分成。尽管在大多数领域利润分成与利润之间一般联系的方向是相同的，即利润越多，分享利润也就越多，但是两者间不是成比例的，有时联系的密切程度高，有时则很低。而且有的部门，例如食品工业中甚至不存在这种一般趋向。在那里盈利率高的企业分享的利润却低。但也有的部门，例如轻工业部门则满足了条件 1 和 2。然而部门间的差别这本身就违背了条件 3，即统一性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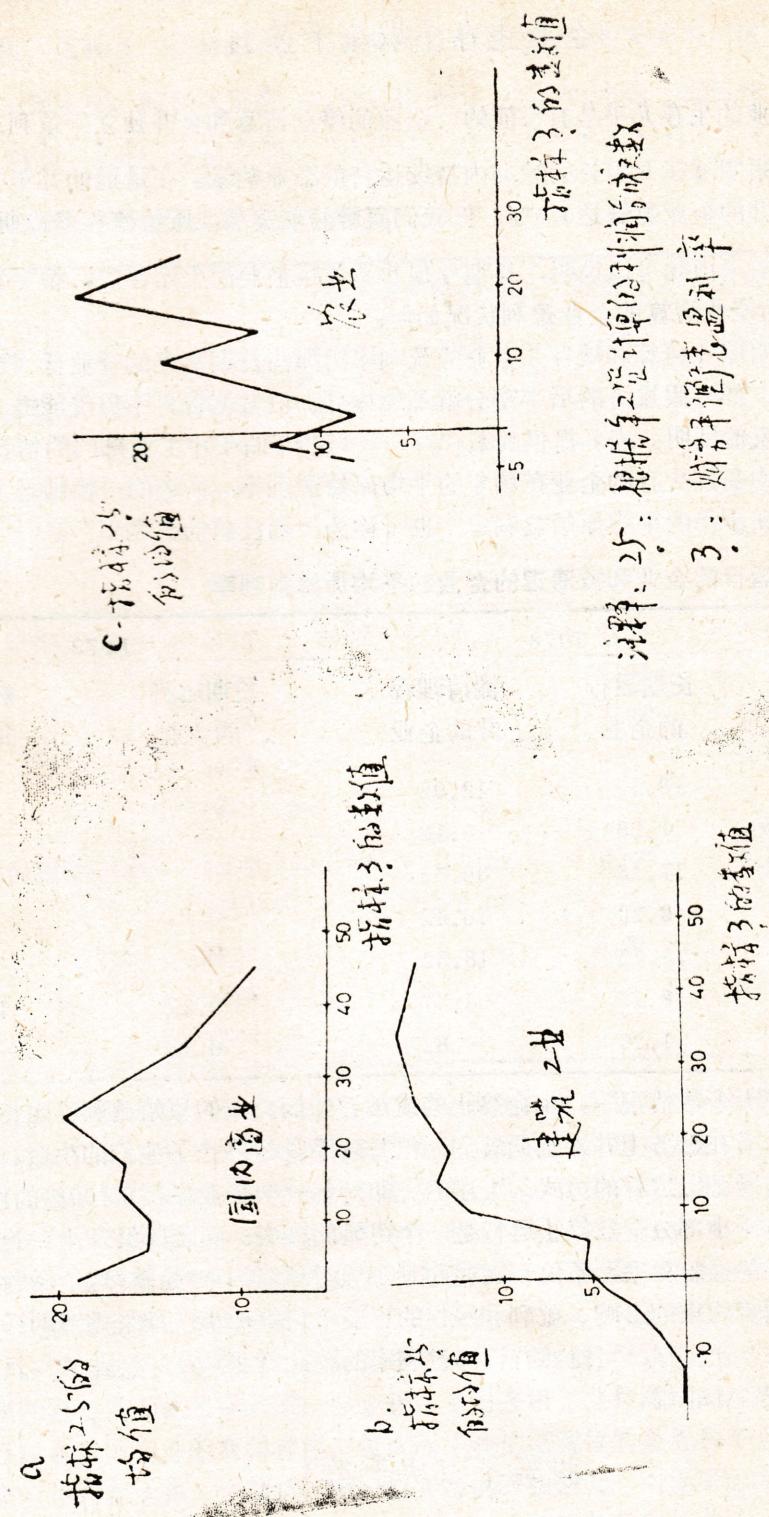


注释：25：根据和资本的利润分成关系

3：财务平衡表盈利率

图 5 1980 年工业企业利润分成和财务平衡表盈利率之间的经验回归函数

对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国有企业进行计算的结果最终证实，假设 3 正确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注释：25：根据年工资计算的利润率的指针数

3：财务平衡表盈利率

图 6 1980年一些国民经济部门利润分成和财务平衡表盈利率之间的经验回归函数

至此为止，我们还没有分析工资和利润及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确实打算探讨这个问题。

企业生存不取决于盈利

假设 5. 企业的生存几乎是有保证的；企业的停业清算和合并独立于盈利之外。

我们现在考察能够在五年长的时期内持续运行的企业数量。在最近的五年中，停业清算和被其它企业吞并的企业数量达6.5%。但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原始盈利率长期为负的企业数是超过20%。看来由此可以说明，长期亏损并不关系企业的生死存亡。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只是，6.5%的停业清算的企业盈利状况如何。

如果能够表明停业清算和被吞并企业的盈利率比那些长期生存的企业低（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那么假设 5 的后半部分就不能成立。但数据资料不但没能提供这样的反驳，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明。表 6 提供的是1978—1979年两年中工业部门的情况。左边一栏是在考察的五年中长期生存的企业在该年的平均原始盈利率，右边的一栏则是下年即将被清理或吞并的企业在该年的平均原始盈利率，也可称为“死亡前的盈利率”。

表 6 长期运行的企业和被清理的企业平均原始盈利率

工业部门	1978		1979	
	长期运行 的企业	被清理吞 并的企业	长期运行 的企业	被清理吞 并的企业
采掘工业	18.10	12.92		
电力能源工业	7.26	8.12		
机械制造工业	17.43	30.50		
建筑工业	8.20	16.42		
化学工业	13.02	18.52		
轻工业	8.76	21.47	9.13	12.02
食品工业	1.26	4.82	6.13	-3.45

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生命终止的或被吞并企业的原始盈利率比长期生存的企业盈利率要高。前者在财务上并未走向破产，但行政手段却终止了他们的生命。

软预算约束有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的，即对每一个企业提供了100%的保证。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有一小部分企业停止运行是一个明显的事。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假设 5 和上面证实假设 5 的经验观察，不仅不削弱而且加强了预算约束“松软”这个命题的真理性。它们进一步证明预算约束的影响、盈利和亏损的影响是何等地小！如果需要的话，行政当局可以使长期亏损的企业生存，而使具有较高盈利率的企业停业破产。企业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行政权力而不是取决于市场。

投资不取决于盈利

假设 6. 投资活动既不取决于上年的原始盈利率，也不取决于上年的实际盈利率。

检验之一，是以十分精细的方式即在企业这个层次上，检验投资活动与盈利率的关系。假设盈利率能够影响投资活动（并且带有时滞），那么就得检验所有国有企业指标1（原始盈利率）1975年的值与指标8（投资活动）1976年的值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个数字可以在表7第一行的第一列读到，即相关系数-0.03。指标1 1975年的值与指标8 1977年的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也是-0.03，如此等等。

表7 盈利率和投资活动之间的滞后相关

盈利率指标	和下述年份指标8（投资活动）的相关系数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原始盈利率	1975 -0.03	-0.03	-0.04	-0.04	-0.02
	1976	-0.03	-0.07	-0.04	-0.08
	1977		-0.04	-0.01	-0.07
	1978			-0.03	-0.11
	1979				-0.08
2、财务平衡表盈利率	1975 -0.07	-0.07	-0.03	-0.03	0.03
	1976	-0.07	-0.04	-0.03	0.01
	1977		-0.04	-0.03	0.01
	1978			-0.04	0.00
	1979				0.00
3、再分配后盈利率	1975 -0.07	-0.07	0.04	0.02	0.06
	1976	-0.04	0.26	0.23	0.13
	1977		0.30	0.27	0.14
	1978			0.12	0.13
	1979				0.09

不论根据哪一种盈利率，哪一种时距结构，只要能在表中找到存在高相关系数的情况，假设6就不成立。但是，表7清楚地表明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相关关系。

对假设6的另一种检验方法总量化的程度较高。其方法是：把工业部门划分为9个子部门（这样工业部门共有10个），再加上6个非工业部门，求出16组企业各自的平均值，然后检验这些企业的平均盈利率与平均投资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盈利率和投资活动之间的时距为两年）。原始盈利率与投资活动的相关系数是+0.15，至于再分配后盈利率，相关系数仅为+0.05。以企业组为基础得出的计算结果同样不能推翻假设6。

对盈利率和投资活动的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是对多组企业作滞后的经验回归分析。图7的数据基础是所有工业企业的有关数据，但实际上我们能观察的是盈利率为正的那些部门的关系。亏损企业中存在这样一个倾向，即一定年份的亏损越大，两年后的投资活动规模越小。但即使亏损最严重的企业的投资活动，也几乎不小于那些盈利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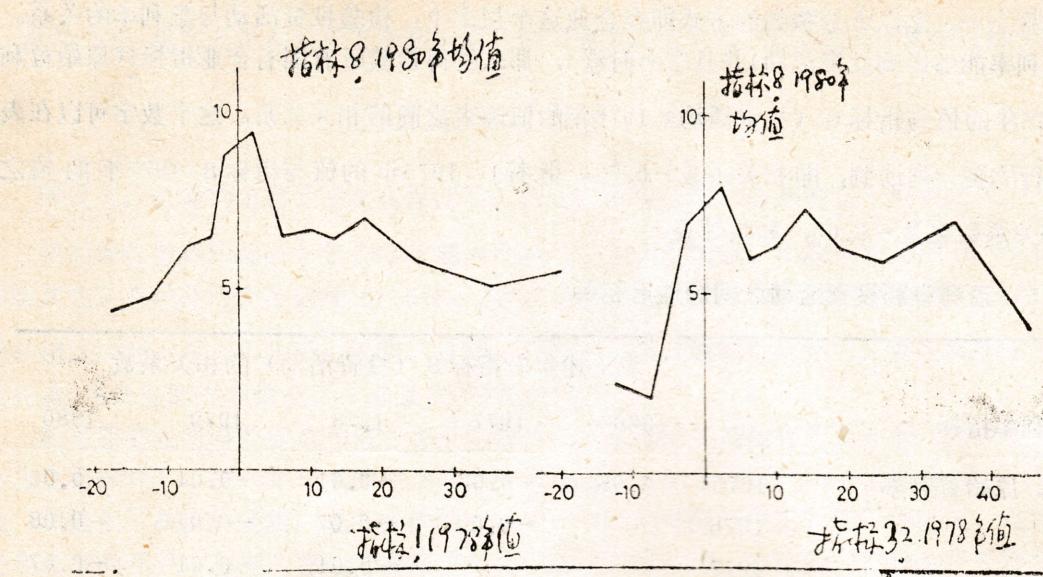


图 7 工业中（不包括食品工业）投资活动和盈利率之间的经验回归函数

注释：1：原始盈利率 32：与资产成比例的盈利率 8：投资与总收入的比率

a、投资活动作为原始盈利率的函数 b、投资活动作为资源收益率的函数

我们还计划作进一步的分析。第一项计算试图表明投资活动大都取决于外部资源、几乎独立于企业内部资源以外；然后，还要分析企业的增长与其利润和盈利率的关系，这种增长可以用各种指标如生产、固定资产、总资产、职工数量等指标表示。

一般的结论

我们的研究并未揭示惊人的新事实，实际上也没打算这样做，我们的目地是用经验事实来检验一些众所周知的假设。应该承认在匈牙利的论战过程中，我们习惯于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论点，而忘记了用怀疑的态度，对待看起来不证自明的现象，并用经验事实加以检验是一个科学家的任务。

我们认为前面提出的六个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这些假设为得出一些一般的结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得出这些结论以前，先对方法论作一重要的评论。我们不希望给人予这样的印象，即借助于大量的数据，假设和由假设引申的结论的真实性就得到“证明”了。对经验证实甚至不应该产生这样的期望，证实命题具有一般有效性的严密的证据，只有以演绎的方式才能得到。一些前题、命题经过适当的转换，就能得出结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回答在一定的前提下结论是否真实的问题。与此相反，在经验方法中不可能明确地证明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假设，即使在数理统计方法中也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检验的是较省劲的问题，即假设离我们观察到的部分现实有多远，现实是接近支持和加强假设还是削弱和疏远假设。后者鼓励理论研究者提出一套更好的假设。由于观察本身可能不准确，数字集合的实际定义难免有问题；由于选择的数理统计程序受一定条件限制，而实际观察不能完全满足

这些条件；由于分析的最后结果可能受到独立于观测指标以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不应当期望经验方法能够给出确凿无疑的证明。

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要防止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对数字和数理—统计分析的威力过份迷信。我们并不能“证明”什么，而只能“支持”这种或那种判断。另一个极端是过多地试验。除了上面提到的限制以外，对每一种数理统计分析都能找到疑点和不确定性，因而每一次经验事实的检验都可以用更好和更精确的计算来补充。这时我们就应该避免“至善论”。如果假设的有效性，能够被理论和逻辑的推理理解和接受，并得到计算结果的支持，那这种研究就是有价值的。当然必须承认继续存在一些怀疑和不确定性。当我们确定假设的证明是否强有力的界限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和主观性。能够得到保证的是，这种检验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即使我们认为能够接受的假设，其他研究者可以在随便什么时候继续前进，根据不同的资料基础作进一步的检验，他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即证实这些假设的谬误，并提出新的假设。

在强调了我们的保留意见以后，我们想我们有权利以极其鲜明而不是谨小慎微的形式，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在匈牙利经济中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正如在文章一开头强调指出的那样，这首先是通过结果来确定的，主要是看企业的生存和投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盈利率。在我们看来，虽然进一步检验增长和盈利的关系是十分有用的，通过检验假设 5 和假设 6，这一论断已经得到了适当的证实。

预算约束的软化也可以从“软化的方法”这方面来考察。文章开头列举了四种主要的方法。在这四种方法中，我们的研究已包括了两种（国家补贴和税收），第三种（信贷体制）和第四种（国家定价）则未包含在内。根据我们的判断，上面的检验能适当地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匈牙利当前进行的再分配的性质本身足以使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这里特别强调“足以”这个词。我们并不认为信贷体制和中央定价不起重要的作用，此外，如果信贷体制和中央定价的实际作用也是“软的”（很有可能是这样），那么，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软预算约束成为一个铁的事实。比较保守的论点是，即使信贷系统和中央定价的作用是“硬的”，匈牙利现行的财政再分配的行为规则也能抵消它们的作用，从而使预算约束软化。

现在我们回到这篇文章中已经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再分配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第一种是，一开始产品价格是固定的，补贴、税收以及它们的部分要素都根据价格来调整。出于一定的考虑（如影响供给和需求的福利政策等），中央的价格政策使产品价格大大高于或低于成本、正常利润和国家税收的总和。通过具体的再分配手段，征调走多余的收入或补偿由于追加的成本而导致的损失。因果关系的另一种形式是如果没有其它障碍的话，税收、补贴是事先固定的，在公开调价或隐蔽涨价的过程中，价格逐渐形成，但已经把税收和补贴因素“考虑在内”了。我们不打算进行这种分离工作，因为这对预算约束的软化和硬化并不重要。我们的注意力不在于发现哪一种税收或补贴“更方便”或“更有希望”，我们希望发现的是再分配过程的多种形式（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在共同施加影响。

我们认为，只要企业之间的再分配比率不是太高，再分配以比较明确的方式进行，那么